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
刘晓勇 应春子等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FROM SHOCK TO THERAPY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著

刘晓勇 应春子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038375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Copyright © 2000, Grzegorz W. Kolodko

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作者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著 者/[波兰]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译 者/刘晓勇 应春子 纪志宏 王卫华 陈慧玲

特约编辑/徐晗笑

装帧设计/戚亮轩

责任出版/晏恒全

责任校对/吴明泉

出 版/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357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排 版/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0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516千字

印 张/19

插 页/4

印 数/3101-6200

图字:09-2000-042号

ISBN 7-80613-983-4

F·334 定价:25元

译丛总序

“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是一套旨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土加肥，增添养料的译著丛书。

改革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二十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在反思、审视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了解、观察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理论探索和思想解放过程，尝试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到体制内攻坚的整体改革推进战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改革未有穷期，尚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方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充满了机遇。这个机遇就在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可能利用后发性优势，从先行国家经历过的诸种问题中获得启发，

慎重地吸取经验,避免曲折,从而降低学习成本,减少摸索时间,用较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走过的路程。因此,善于学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编辑出版“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不同于一般丛书的是,这套译丛的选题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者专业,而是以我国的现实需要为导向,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只要是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有借鉴意义的著作,都是我们的选择对象;既包括最新的探索性成果,也包括各学科过去的经典之作。之所以包括后者,是因为中国的长期封闭,我们的学者甚至对国外各门类的经典著作也一无所知,所以有必要加以介绍,以便于我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尽可能利用我们与国外前列学者的交往,为中国的读者介绍更多更好的国外研究成果及经验性文献,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二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和世界接轨,要想不落后于时代,拥有与世界的对话能力,从而改革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就必须洞悉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才能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然而由于资讯网络尚不足够发达,加之语言的隔阂,使我们失去了一些了解和学习的机会。翻译出版正是一座桥梁,可以使更多的人共享这些智慧资源。当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并非本译丛中所有著作的所有观点都为我们所认同。在我们看来,只要它们具有某种代表性,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就有积极的意义。

“当代经济发展研究译丛”将采用滚动开发、陆续出版的方式,不断丰富书目,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思想火花和实践借鉴。

吴敬琏

出版者言

20 世纪刚刚结束,在这段人类既历经磨难同时又充满了成就、进步和梦想、希望的历史中,转轨经济的历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然而,转轨由市场、政府、制度、政策和利益集团、国际组织牵引,从 1989 年到 1998 年乃至 21 世纪的前 20 年,已经并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

本书作者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1994—1997 年),被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现任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波兰总统经济顾问。1997 年夏天,中国改革基金会曾邀请作者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改革会议,并提供关于波兰转轨前(80 年代末以前)经济改革失败的论文。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作者 1998 年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做高级访问学者时完成的,重点论述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的历程,并将这一进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进行了比较。

从以下几点看,本书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

1. 作者十分重视政策设计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决定)作用。作者将独联体和东欧各国 90 年代的改革历程称作“后社会主义”,作者认为,这些国家市场化转轨中许多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政策的设计,“高质量的增长必定基于高质量的战略和政策之上,如果转轨被看成一个制度重新设计过程的话,有必要对转轨政策和发展政策进行区分,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能力,而发展的政策应当能充分利用现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制度怎样,好的政策总有作为的余地,就像政策失误一样。”“转轨还应当被看成是长期发展政策的一个工具,而不应将其本身视为一个目标。”这可以看作本书的基本观点,全书围绕这一基本观点,探讨了市场化转轨进程中的政策得失,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意见和丰富的资料,这些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显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2. 作者在本书中详尽地分析了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激进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只能造成体制真空,既无计划也无市场,导致经济大衰退,这一点正是前苏联和东欧市场化转轨起步最大的政策失误。作者因此对西方有关论点和政策进行了分析批判,对中国和越南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持肯定态度。作者指出:“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

3.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近期西方国家学者竭力扩散的思潮,从长期看,作者也是主张经济自由化的。但作者深入研究了经济转轨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认为成功的向市场经济的

转轨需要政府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参与。“转轨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自由市场的盲目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只有当市场完全成熟,没有缺陷并有效地为政策所控制时,它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换句话说,它无法完全自由,事实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自由。只要这一点是错误的——它确实是错误的——即自由市场能最好地为自由社会服务,那么政府就必须干预市场的运作,使之服从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尽管独联体和东欧经济转轨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取向根本不同,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却是一致的。从本书看,这些国家关于经济转轨的思考,特别是对休克疗法的反思,已逐步理性化,仔细研究它们的思想成果,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教训、经验,对我国深化改革是有益处的,而这正是我们决定引进出版此书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由于这些国家转轨的资本主义取向,作者无法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抽象出来,把一些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的分析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看法显得苍白无力,也不适合我国国情,请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与把握。

致 谢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于1997—1998年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研究国际学院(UNU/WIDER)担任杰出的 SASAKAWA 教授和发展政策研究教授以及1998年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

我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获益良多,特别是从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研究国际学院院长吉约万尼·安德雷·科尼亚(Giovanni Andrea Cornia)的中肯评论与有用建议中受益匪浅。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本书就很难完成。

我还要感谢巴黎大学的玛丽·拉维尼(Marie Lavigne)、西雅图大学的卡兹·波兹南斯基(Kaz Poznanski)和Kaiserslautern大学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的评论和建议。

最后,我要最衷心地感谢著名经济学家和真诚的朋友、伦敦经济学院和罗马大学“La Sapienza”的

从休克到治疗。

D·马里奥·纳提教授(D. Mario Nuti)的一贯支持。在我于1994年至1997年担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期间,他曾是我信赖的顾问,也是本书写作进程的要求很严的见证人。现在,本书已经完成,得失该由读者来评判。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1998年7月4日

于华盛顿特区

我知道谬误后面总有真理，
只要值得探求，人们坚定信念就能找到。

——约翰·洛克
(1632—1704 年)

导言

21 世纪的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①转轨过程。在欧洲和亚洲一共有 30 多个国家——其人口多达 15 亿或占全人类的 1/4,卷入了这场急剧而壮观的变革。它不仅事关这些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前途。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及其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性的尝试并非是告别共产主义的过程,而是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即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和过去的中国,党的领导谈到“共产主义”时大多是指一个目标或者最终目的地,而决非指业已存在的现实。东欧国家在 1956 年后非斯大林化所引发的变革浪潮中就已经放弃了

① 作者所谓的“后社会主义”是特指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译者

这种梦想。在那之后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此,目前的变革浪潮——这是试图实行社会主义体制以来最主要的变革,应当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实际上,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

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在于通过一些改进而非根本制度的变化来对现存制度进行完善,与此相反,转轨则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而不再是仅仅通过改进运行方式来完善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

可以说,一些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经历这种转轨,而其他部分国家则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革和重建。它们已经走出了传统的中央控制经济阶段,但同时却尚未从社会主义进入转轨阶段。当然,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表明,它们的制度、结构、政策以及行为都在发生变化。从总体上来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转轨都同时在进行之中。

根据上述定义,后社会主义的转轨始于1989年后,这里有两个事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一是1989年2—4月的波兰“圆桌会议”辩论(作者曾经参加),其二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推倒柏林墙的决定。显然,如果波兰没能达成历史性的妥协,转轨还不会开始,至少还要推迟一段时间。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决定纯属政治性的(尽管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话,波兰的变化则确实是长期渐进式经济自由化进程的一个重大突破。

因此,在讨论改革与转变(即转轨)时,人们必然要回顾一

下是什么使得整个制度发生了改变以及导致变化的原因。但同样必要的是,人们应当预测今后若干年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如何控制发展的进程从而使未来比过去更美好。因此,书中大量篇幅集中于对过去 10 年的讨论,时期主要是 1989—1998 年,但一旦必要,讨论也会从对过去的追根溯源引申至对未来目标的展望。由此,在寻找“是什么引发了转轨”这一问题的答案时,人们必须追溯至 1950 年,而在探索长期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人们又必须前瞻至 2020 年左右。

至于本书所讨论的国家,东欧经济、前苏联、中国、蒙古、亚洲东南部诸国以及朝鲜和古巴都在讨论之列,但比较分析并没有花费同样的笔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没有进行国别研究,而仅限于对后社会主义转轨的一般讨论。不过,大家在此仍可以看到许多例子和国别研究案例——从东欧到中亚到西太平洋,但只是为了给一般讨论和结论提供一些背景。要想以这种方式提供一个完整的思路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人们对于什么是或不是转轨仍然心存疑惑,因此,相关的文献中涉及的主题并非总是相同的。为此,本书就此给出了明确定义:后社会主义转轨就是以市场经济替代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过程。

从这一角度来看,有些情况还要走着瞧。譬如:中国和越南(也包括市场化改革滞后的一些前苏联共和国)是已经走上转轨道路还是仍然限于对旧体制的改良?一方面考虑到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机制,另一方面再考察一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人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正处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然而,这种转变的过程还不是很确定。

无疑,这两个国家与当初引入社会主义制度时相比,其经济机制和发展政策工具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然而,它们进

行改变的进展还比不上大多数的东欧国家。

不过,一些国家转轨成功的榜样确实会对其他国家的指导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包括所有的后苏维埃新兴市场国家和改革中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示范性影响在传播后社会主义的转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像朝鲜和古巴这些国家也将走上转轨之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转轨最初只见于部分国家——主要是迫于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日益低下的效率和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缺乏竞争力,但在这种示范效应的作用下转轨最后也会扩展到整个地区。

后社会主义转轨包括一系列的变化,也会触及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相互作用: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之间;经济在新环境下的运行方式与社会对此作出反应的方式之间;人们的工作行为方式与政府的管理方式之间;最后,国际舞台上伙伴们采用的手段与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之间。说得更严重一点,如果不对转轨的非经济方面给予足够的注意,人们对转轨的经济方面也难以理解并作出正确的解释。

因此,应当对向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变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给予适当的关注。由于政治斗争随转轨而来,这种关注就更为必要。市场化进程同时伴随着民主化,从长远来讲,这使整个转变过程更加顺利,但从短期来看,它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政治障碍。改进分配效率和提高竞争力的努力往往与争取收入和财富新的再分配方式相伴随。

转向市场并非只是简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因为它伴随着复杂的结构与制度调整以及社会与政治变化。因此,在争取被认为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新经济秩序(如果存在的话)的斗争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设法为他们自己在新的经济配置中谋得尽可能有利的位置。这场争斗会有胜利

者,但他们也都是输家。最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应当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有关转轨的一个最有趣的方面就是衰退与增长的过程。不管怎么说,转轨的初衷是迫于提高经济增长能力的需要。然而,最初的结果是事与愿违,整个地区的经济大幅度下降,后来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恢复元气,重返增长之路。迟至1998年,在转轨近10年之后,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共同体(CIS)^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不到1989年——这一年通常被用作比较的基准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

所有这些提出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转轨期的衰退程度会如此严重,持续时间会如此之长?是人们当初所抱的期望过于乐观,还是所实施的战略和政策有错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产出下降时间持续达8年之久,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一半以上?甚至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更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采用合适的发展战略来恢复生产并保持高增长?这是获得政治支持从而使得这种巨大变革能够继续下去的必要前提,也是人们对美好前途抱有期望的基础。否则人们会问,他们忍受这么多艰难困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些带头转轨的国家里出现了这种情形,即:生产在大幅度下降并

① 按照这种分类,独联体国家包括除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12个前苏联共和国,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所称的中东欧国家包括15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但是,如果按“前苏联”和“东欧”划线的话,则前者有15个国家,而后者是12个。虽然也会不时地提到前东德,但这里没有计入。如果详列的话,其他国家也会考虑进来。它们是:蒙古(它属于转轨经济范畴)、中国和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古巴和朝鲜。因此,包括前东德在内,共有35个国家。

伴随社会压力(由于贫困增加而不是减少)之后开始享受高增长率。当初是否可能恢复更早、增长更快一些呢?还有一个对未来发展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刚走出转轨衰退谷底中的那些国家还有机会取得显著的进步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政策的设计。高质量的增长必定基于高质量的战略和政策之上。如果转轨被看成一个制度重新设计过程的话,有必要对转轨政策和发展政策进行区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能力,而发展政策应当能充分利用现有制度的优越性。每个制度下都是如此,不独复杂的转轨时期是如此。换句话说,无论制度怎样,好的政策总是有作为的余地,就像政策失误一样。健全的发展战略,加上国家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经济成功处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自己国家和国际社会双增长的愿望。

转轨还应当被看成是长期发展政策的一个工具,而不应将其本身视为一个孤立的目标。只有当生产率增长、竞争力与效率提高,从而生活水准——包括消费、社会资本质量和自然环境方面——必然也提高时,才能说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合理的。然而,政策目标往往是彼此冲突的。通常,政策会因为迎合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而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转轨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带有政治特性。

转轨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与政治的联系更甚于与经济的联系。过去 10 年的转轨经验清楚地表明,主要的困难不在于处理问题的理论知识不够,而在于政府没有能力根据这种知识和经济的基本原理来实施政策——而人们正是设想新的后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按照这种原理来运作的。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政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却往往行不通。这就是政策设计者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境。